



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

□ 孙英臣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有一个文学流派，叫作“山药蛋派”。今天看来，这个文学流派的名字简直土得掉渣儿，想当年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山药蛋派”的“盟主”赵树理和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作家，在中国文坛可以说是享有盛誉。虽然随着时光流逝，现在的年轻人对“山药蛋派”和赵树理了解不多了，但是，钩沉往事，重温历史，会给我们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1906年9月24日，赵树理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农村是他最熟悉、最亲切的场景，农民是他最了解、最接近的人群。常年在泥土里摸爬滚打，赵树理对农村的一切都有着很深的感情，对民间艺术更是情有独钟。沁水县有一种以说唱为主曲艺形式，叫沁水鼓儿词，赵树理对这种唱腔洒脱不羁、唱法原始天然、表演诙谐幽默的鼓儿词十分喜爱，15岁就学会了沁水鼓儿词的吹拉弹唱和掌鼓板。青年时代，赵树理外出求学和流浪期间，经常走访传唱鼓儿词的民间艺人，和他们一块儿打打板，唱唱鼓词，探讨唱段。如果说乡间的智慧、农民的情感哺育了赵树理，那么，沁河两岸柔风细雨般的民间艺术，则滋养、浸润了赵树理的心田。

1925年夏，赵树理考入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学校读书期间，他接触到新文学和左翼文学，受到深刻影响。1927年秋，他参与领导了四师学潮。斗争取得了胜利，但赵树理却因此被四师开除，并于1929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入非正式监狱自新院。1930年，赵树理获释后，开始在太原等地流浪。1936年，他到上党联立乡村师范学校教书。其间，他创作有韵小剧《打倒汉奸》《打灶王》以及小说《金字》《盘龙峪》等作品，并和学生一起演出，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树理参加牺盟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受党组织委派在长治市壶关、平顺、武乡等地编辑报刊。他把用新文学拯救农民思想的念头付诸实践，致力于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用自己所熟悉的

的民间艺术形式如鼓词、快板、童谣、故事等，发动人民抗日、揭露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宣传抗日根据地的新事物。十多年来，赵树理不仅从一个爱好民间艺术的农村青年变身为一位编辑、作家，而且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赵树理文学创作上的蝶变，发生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篇讲话发表后，如同拨云见日，廓清了文艺工作者的困惑。他们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沸腾的生活，走入人民大众之中，赵树理则是在抗日根据地最早自觉实践讲话精神的作家之一。

1943年4月，担任中共北方局调研室调研员的赵树理深入山西左权县。当时土改刚刚开始，地主妄图利用部分群众的愚昧和封建迷信思想阻挠土改。赵树理在同驻地房东的一个到县里告状的亲戚拉家常时得知，他们村民兵小队队长岳冬至因为与智英祥自由恋爱，被几个把持村政权的坏人以“搞腐化”的罪名迫害致死。赵树理到发案的村子做调查时发现，村里人包括受害者两家都不同情两个年轻人的自由恋爱。当时根据地刚刚颁布了《妨害婚姻治罪法》，赵树理认为青年人自由恋爱结婚应当得到支持和保护。为了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以岳冬至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以农村日常生活、家庭婚姻为题材，表现出了对时代强烈的关注意识，蕴含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其创作目的就是力图把人们从封建旧势力的束缚中拯救出来。由于揭示了农村问题，堪称农村生活启示录，《小二黑结婚》在太行山根据地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版就印了2万册。曾采访过赵树理的美国记者贝尔登在其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中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

1946年六七月间，赵树理的另一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这篇小说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农民和地主围绕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展开的尖锐复杂斗争。小说主人公李有才带领小字辈，以板话为武器与地主作斗争，最终机智勇敢地夺取了胜利。这篇小说采用板话形式，有说有唱、夹叙夹议，生动活泼、脍炙人口，加之情节波澜起伏、格调风趣乐观，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李有才板话》连载首日，配发了冯牧的评论《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连载结束后，《解放日报》又刊发了题为《论赵树理的创作》的文章，文章把赵树理和他的创作评价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赵树理随他供职的新大众报社进入北京。新大众报社被全国总工会接管后，他先被调往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当处长，不久又被选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他筹备组织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了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对推动北京市普及文艺运动作了有益的贡献。但是他离不开农村，因为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中。1951年春，赵树理离开北京，赴山西晋东南深入农村生活。行走在晋东南青山绿水间的赵树理，显得如鱼得水。他笔耕不辍，创作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以及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长篇小说《三里湾》等生动鲜活的作品，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受人民喜爱的作家。

时代的发展呼唤为人民而创作的文学家艺术家。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文艺工作者应该以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为榜样，像他那样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中，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见证历史荣光的红色精神殿堂

□ 靳凤林



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如果说一个民族只有归属感到与其祖先和血脉相关联的存在结构之中，才能开拓出自己的生存空间，并锻造和升华出笃定的独特品格，那么一个政党只有“知所从来”，才能“方明所往”，今天无数共产党人不断到延安的黄土高坡上瞻仰革命圣地、红色旧址和各种历史纪念场所，目的就是要重温那一段峥嵘岁月，守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古人云：“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回望来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再造辉煌，无疑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中央党校大礼堂以延安窑洞的形象作为主基调，将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之中，能够使教职员工和广大学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党性教育和文化熏陶，



不断抵达历史的深处，倾听历史的回响，感悟历史对今天的深刻启迪。

在大礼堂的正前方是一处长方形的大广场，广场的东西两面各种植有一排榆叶梅和两排圆柏树。每年春天一到，一树树榆叶梅，花团锦簇，灿烂多姿，清香宜人，在晨露里含笑绽放，远远望去，一个个硕大的花球在春风里摇曳着娇媚的身姿，彰显出“百缕千枝红似火，驱霜拨露自逍遥”的诱人景色，引来无数路人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榆叶梅的花朵大约是承袭了梅花的风姿，粉红色花瓣层层叠叠，花芯里长出一根根细细的花丝。但是榆叶梅的花期十分短暂，从开到落不过十几日，随着花瓣的飘落，青青的果实便催着绿叶接踵而至，正所谓“花褪残红青杏小”，“万叶欣欣绿”。与榆叶梅稍纵即逝的烂漫花朵相比，旁边的圆柏树则是“生命之树长青”。兴建大礼堂时在广场东西两侧栽种了两排圆柏树，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它们大多高达十米以上，底部周长也超过三四米，整个树干浑圆挺拔，枝繁叶茂，里面的树皮呈深褐色，成条片状纵向开裂。它们经年累月高高耸立在这里，不畏酷暑烈日，不惧寒风霜雪，既是这座历经风雨的大礼堂的守护者，也是中央党校历史沧桑的见证者。

在大礼堂广场的正中心矗立着一尊毛泽东雕像，题名为《我们的老校长》，以毛泽东一生中延安时期

文天祥的浩然正气

□ 徐晓方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以降，以浩然之气闻名者，当推宋末名相文天祥。文天祥出生在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的庐陵。年少时，他见到学宫祠堂里供着乡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等人的画像，谥号都有“忠”字，便慨然立誓说：“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文天祥的一生，也正如他的这句誓言，忠于宋朝，威武不屈，慷慨就义，体现了大丈夫的浩然正气。

正道难行，退隐守志。文天祥文才惊世，年仅21岁就高中状元。1259年11月，南宋边关告急，内侍董宋臣主张迁都四明。文天祥得知后，决定冒死进谏。当时文天祥为父守丧期满，刚回朝补授官职，还未正式就职，他便以“教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借奉诏献书之名，呈上洋洋万言的《已未上皇帝书》，力劝宋理宗保国家、割私爱，将佞臣董宋臣明正典刑，以安军心。同时，又提出抗击外敌、保境安民的四条主张，即简文法以立事、仿方镇以建守、就团结以抽兵、破资格以用人。然而，宋理宗对这篇上书没有任何回应。文天祥深感正道难行，毅然辞官返乡。后来，朝廷多次对他征召，由于奸臣当道，言路不通，救国救民的抱负无法施展，文天祥选择了退隐，以保全气节。

保全气节。

毁家纾难，磁石丹心。1275年初，元军逼近临安，朝廷下《哀痛诏》，命各地起兵勤王，并传旨给文天祥，要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强敌压境，国之将倾，文天祥毫不犹豫地挺身接诏。“国有大灾大患，不容不出身捍御！”文天祥在《跋彭叔英谈命录》里，早已表明了捍卫国家的决心，此时更是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然而，对于一个早已隐退的文士来说，募兵勤王并非易事。文天祥除了朝廷的一纸诏书和一个十多年前担任过的江西提刑的头衔之外，并无其他倚傍。为了招集义兵，他上下奔走，登门聘请陈继周、陈逢父为军幕，联合赣州豪杰共同起兵。为了筹集军费，文天祥带头毁家纾难，掀起捐资热潮，不仅解决了军费之急，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军心。1276年初，元军三路大军在临安北郊不足三十里处驻扎，元右丞相伯颜指定要宋廷丞相前去乞降，当时的南宋右丞相陈宜中听说后连夜潜逃。无奈之下，谢太后只好升任主战的文天祥为右丞相，令他到元营洽谈投降事宜。伯颜本以为来者应当卑躬屈膝，俯首称臣，没想到文天祥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于是勃然大怒，

威胁要处死文天祥。文天祥正气凛然，毫不畏惧，说道：“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伯颜无奈，将其软禁并扶持往大都。中途，文天祥趁元军不备脱身，历经九死，南下投奔朝廷。“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一名句，就出自他回到长江口时所写的《扬子江》一诗，表达了他忠于宋朝的磁石之心。

身囚志坚，正气浩然。1278年底，文天祥兵败后自杀未果，不幸被俘。他写下撼人心魄的《过零丁洋》，表达了以死殉国之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元将张弘范要他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时，文天祥就抄录了这首诗，并义正词严地说：“我自教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在阴暗的土牢中，文天祥又做了一首《正气歌》以表明心志：“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面对死亡威胁，文天祥铁骨铮铮、大义凛然。1282年，忽必烈亲自劝降，以委任宰相之职相利诱，文天祥丝毫不为

的体魄特征为摹本。整个雕像总高6.5米，主体呈古铜色，基座为白色。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正处于中年时期，他肌丰骨劲，神情肃毅，气清容静，心笃意坚。

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在中央党校发展史上留下了一份特殊荣光和亲切记忆。在他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4年里，正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并开启解放战争大幕的关键时期。作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涌现出的党的杰出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他在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之余，高度重视和关心党校建设，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确定了党校的办学方向，计划安排了党校教学的主要内容，为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多次给学员授课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毛泽东的伟大形象为中央党校树立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在大礼堂广场最南端的正中位置，安放着力9.9米、高2.1米的校训碑，碑身为灰色泰山原石，在空明澄碧、洗尽纤尘的蔚蓝色天空下，远远望去，给人以质朴厚重、势沉力大之感。校训碑的两面分别是毛泽东题写的“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九个大字。这九个金色繁体字大气磅礴，雄健洒脱。前者主要代表了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后者集中表述了党的根本宗旨，二者高度统一，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髓，又突出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上下班走过这里，我时常想到，在我们党百年光辉历程中，党的事业的兴旺与发达，党员干部自身的履职尽责成效，无不与能否根本遵循这九个字息息相关。从思想根源与哲学本体论上讲，这九个大字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性光辉的最高体现吗？



所动，表示自己决不做二姓之臣，唯愿一死。他早就准备好了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临刑前，文天祥向南拜别故国，从容就义。

文天祥一身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宋后，无论是封建统治者，还是士大夫、民间百姓，都对文天祥的英雄气节充满赞誉。明朝名将于谦称赞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清朝皇帝乾隆评价他：“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文天祥的浩然正气，鼓舞了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在国家危难之际，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尽忠报国！

